

毛泽东

战略决策思想研究

张爱民◎著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夜，在长沙橘子洲头，写下了这首《卜算子·咏梅》。词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首词，不仅表现了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也体现了他“只把春来报”的无私精神。这首词，是毛泽东在革命低潮时期，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体现。这首词，是毛泽东在革命低潮时期，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体现。这首词，是毛泽东在革命低潮时期，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体现。

毛泽东

战略决策思想研究

▼ 张爱民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战略决策思想研究 / 张爱民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640 - 5797 - 8

I. ①毛… II. ①张… III. ①毛泽东思想: 战略思想 - 研究
IV. ①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9749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68914775(办公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 www. bitpress. com. cn](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5.25

字 数 / 210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46.00 元 责任印制 / 王美丽

►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什么是“战略”	(1)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战略”的理解	(2)
二、西方管理学界对“战略”的理解	(6)
三、战略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8)
第二节 战略决策的含义与基本原则	(12)
一、战略决策的基本内涵	(12)
二、战略决策的基本原则	(14)
第三节 文献回顾	(15)
一、近30年来国内外对毛泽东其他思想的研究情况	(16)
二、国内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决策思想的现状	(18)
第二章 毛泽东战略决策思想的来源	(22)
第一节 青少年时代人文环境的熏陶	(22)
一、生活环境的影响	(22)
二、早年求学生涯	(25)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积淀	(28)
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土壤	(28)
二、自学成才的战略家	(29)
三、中国古代战争史的启示	(31)
四、小结	(34)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35)
一、世界观的转变	(35)

二、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关注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36)
第四节 革命的实践	(39)
一、毛泽东战略决策思想的萌芽	(39)
二、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与毛泽东战略决策思想的 发展	(43)
三、毛泽东战略决策思想的基本成熟	(44)
第五节 伟人的独特气质	(47)
一、毛泽东的战略胆识与气魄	(47)
二、领袖特质与“拿延安换中国”	(51)
三、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与武者风范	(54)
四、毛泽东的“猴气”与“虎气”	(57)
第三章 调查研究是战略决策的起点	(61)
第一节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61)
一、调查研究思想的来源	(62)
二、《反对本本主义》与调查研究	(63)
三、调查研究思想的哲学依据	(65)
四、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础	(67)
第二节 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法宝	(68)
一、主观主义是科学决策的大敌	(68)
二、理论和实践要结合起来	(70)
三、整风运动	(72)
第三节 总结经验是从事间接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	(73)
一、认识始于经验	(73)
二、总结经验就是对事物的认识	(74)
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战略决策的形成	(75)
第四节 调查研究的技术	(77)
一、开调查会	(77)
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78)
三、间接调查也是重要调查手段	(79)
四、调查态度要严谨	(80)

五、要注意调查和研究的有机结合	(81)
第五节 调查研究就是为了进行正确的战略决策	(82)
一、胸中要有“数”	(82)
二、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84)
第六节 小结	(85)
经典案例 1: 毛泽东的神机妙算	(86)
经典案例 2: 《论十大关系》的制定	(88)
第四章 群众路线是正确决策的根本保证	(90)
第一节 兵民是胜利之本	(90)
一、人民群众的战略地位	(90)
二、人的因素是始终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	(92)
第二节 从群众中来——战略决策的初始论证和战略方案的 选择	(94)
一、群众路线的含义	(94)
二、收集战略环境信息的渠道	(95)
三、民主集中制是决策民主化的制度保证	(98)
第三节 到群众中去——战略决策的实现与完善	(101)
一、人民群众是战略过程的主体	(101)
二、战略决策的实施效果要禁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	(107)
第四节 为人民服务——战略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110)
一、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110)
二、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111)
经典案例 1: 战争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115)
经典案例 2: 人民的需求就是决策的依据	(116)
经典案例 3: “精兵简政”政策的由来	(117)
第五章 全局观是战略决策的着眼点	(118)
第一节 全局观概说	(119)
第二节 毛泽东的全局观	(120)
一、全局是各方面和各阶段关系的总和	(120)
二、从系统和整体的观念出发把握全局	(122)

第三节 准确把握对全局工作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是驾驭全局的关键	(126)
一、要抓住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工作全面发展	(126)
二、对主要局部予以重点关照	(127)
三、“不要四面出击”	(128)
第四节 实事求是地选择工作重点是实现全局目标的基础	(129)
一、实事求是确定工作重点	(129)
二、及时调整重点工作的顺序	(130)
第五节 对非重点局部的合理关照有助于推进全局的健康发展	(131)
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决策思想	(131)
二、要学会“弹钢琴”	(140)
第六节 全局观是毛泽东处理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思想武器	(143)
一、从战略地位的高度来把握中国共产党同各界群众的关系	(143)
二、全局观是应对宗派主义倾向的思想武器	(144)
三、全局观是毛泽东处理党际关系乃至国家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145)
经典案例1：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46)
经典案例2：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147)
第六章 独立自主是战略决策的灵魂	(149)
第一节 “独立自主”决策思想的基本内涵	(149)
一、独立自主思想的初步提出与逐渐成熟	(149)
二、独立自主战略决策思想的基本内涵	(150)
第二节 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152)
一、自力更生是独立自主决策思想在经济领域的直接反映	(152)
二、大生产运动	(153)
第三节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156)
一、坚持独立自主是保持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156)
二、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不动摇	(156)

第四节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	(159)
一、基本内容	(159)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党外交政策的基点	(160)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处理国际援助问题的 基本准则	(161)
四、独立自主是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 保证	(165)
经典案例1：争取主动，入朝作战	(166)
经典案例2：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	(168)
第七章 战略与策略	(170)
第一节 战略决策之策略性的认识论依据	(170)
第二节 战略与策略的辩证关系	(172)
一、策略的含义	(172)
二、制定策略的原则	(173)
三、战略和策略的关系	(176)
四、战略上蔑视敌人与困难，战术上重视敌人与困难	(178)
五、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80)
第三节 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182)
一、何谓“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	(182)
二、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关系	(184)
三、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是战略决策的重要策略原则	(185)
经典案例1：“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	(192)
经典案例2：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针锋相对策略	(193)
经典案例3：重庆谈判	(194)
第八章 战略指导者的决策素养	(196)
第一节 独立自主的思考与决断能力	(196)
一、基本内涵	(197)
二、战略指导者要“智勇双全”	(200)
第二节 战略预见能力	(201)
一、什么是“战略预见”	(201)

二、战略预见的重要性	(203)
三、进行战略预见的局限性	(205)
四、做好各种可能性的转化工作	(206)
第三节 创新意识与能力	(208)
一、什么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08)
二、创新意识与能力对于战略指导者的重要性	(209)
三、培养和提高战略指导者的创新意识与能力的方法与 途径	(210)
经典案例：“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215)
结束语	(218)
参考文献	(220)
后记	(232)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什么是“战略”

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管理思想家之一。他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与胆识，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洞幽察微，审时度势，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的顺利推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战略思想家，毛泽东对“战略”一词的含义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①。毛泽东的这段论述虽然看起来是从军事战略管理的视角出发的，但他却对“战略”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首先，战略是普遍存在的，其研究对象是关乎组织发展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或策略。其次，由于全局的内涵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战略的具体内容则应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就是说，战略也是有层次的。再次，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带有全局性的规律性东西指导人们的具体实践，充分照顾到全局中各个局部或事物不同发展阶段的起承转合关系，最终实现将各个局部或发展阶段统一到全局的总体发展轨道上来。按着这样的理解，“战略决策”即各种管理活动中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战略”的理解

纵览中国战略思想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历史的和方法论的局限，“战略”的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但先秦以降，多变而竞争激烈的历史环境、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战略管理思想家。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兵书保存了世界上最早的战略思想的记录，其中以《孙子兵法》最为著名。该书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理论原则，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名著，为世界战略思想研究界所推崇，至今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孙子兵法》中所讲的追求“全胜”的战略目标设计，“五事七计”的战略分析范式，有备而战、速战速决、避实就虚、争取主动的战略制定与实施原则，一直为当代战略管理学者所津津乐道。

其实，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绝不仅仅限于军事斗争领域。与孙子齐名的治国战略思想家、军事家吴起当时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政治和军事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在其名著《吴子》中将对内的军队管理与对外战争结合起来加以论述，并开始关注大战略层面的问题。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认为，组织要想在惨烈的竞争中占得先机，就必须进行积极准备，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战争是政治的产物，国家的内部经济与政治的稳定是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这已是现当代战略学者的普遍共识。

在治国经邦乃至人生修养等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战略管理思想。所谓“治国”，在中国古代主要是指国家机器按着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对社会进行组织协调与管理的活动。而治国思想则是关于治国原则、方法、理念和手段的具体认识和主张，即治国经邦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治国思想体系中，“大一统”历史观和追求长治久安的治国战略管理目标，是传统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旋律。在不同历史时期，则形成了不同的治国战略管理思想流派，如先秦时期的儒、墨、道、法四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治国战略理想是实现“大同世界，小康社会”；而道家则崇尚“小国寡民”，将“无为而治”作为其基本国策；法家追求的是“至安之世”，治国理念是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并用，主张对内君主操权任势，对外实行以强权和武力为基础的武力吞并与扩张政策。法家所倡

导的“耕战”的强力政策正好切中当时诸侯争霸的要害，并成为秦帝国治国兴邦的基本方针。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形成时期。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治国思想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本上确立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国战略思想的规模与架构，基本解决了封建统治秩序在战略出发点与最终战略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基本框定了封建专制社会体制下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治国战略的范畴，其中包括“仁义”、“德刑”、“礼法”、“王霸”、“赏罚”、“义利”、“夷夏”等。当时的思想家对上述这些范畴均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思路和对应的解决方案。至于后世的其他治国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所确立的治国战略思想，从哲学、伦理或其他层面所进行的深层解读与阐释。

中国古代人生战略管理思想是治国、治军战略思想的基础，主要是指对人性、人生进行自我管理与规划的战略管理思想。人生战略管理思想与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易经》中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生战略进行规划和管理的最早论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之一。后世儒家要求为人“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而亲仁”，“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核心概念是其崇尚的基本为人规范与信条。道家追求的是“无为而治”、少私寡欲、洁身自好、返璞归真的“逍遥游”境界，显得有些超凡脱俗。墨家的人生理想是“兼相爱，交相利”，耐艰苦的公利主义。法家则倡导功利性人生观，为了建功立业可以勇往直前，置生死于度外。

由上述可见，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战略家关于战略的思想非常丰富，已经涵盖军事、治国经邦和人生修养等各个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对“战略”这个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当时还没有“战略决策”这个专门术语，但是战略决策的运用实践与相关理论已经处于初步形成的状态之中了。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战略家们在长期的军事或治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任何成功的战略的制定都要综合考虑人员、时间、地形、气候、外部环境等主客观诸因素，要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和安排来统筹谋划，在全面分析利弊得失后，最终做出是否采取战略行动的决定。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决策的过程。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前，中国战略家在筹划和指挥方面，就已经有了

“庙算”之说。后来，人们把对战争的认识和谋划与进行战争的方式方法、军队管理及作战具体行动等统称为“兵法”。譬如：著名军事战略家孙武在其《孙子兵法·计篇》中就有关于“五事七计”的经典论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①这段话的大意是：战争关系到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因此，战争领导者要从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等五个方面进行认真的综合比较分析，探索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同时，还要从君主的政治清明和政策正确程度，将帅是否有才智，以及各方所占的天时与地利状况等方面认真比较、筹划，从而探求敌我双方胜败的基本走势。孙武在此讲的就是战略分析问题。战略分析是战略决策的重要起点。高明的战略家和指挥官能够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运筹”，即事前进行精心的筹措谋划、分析研究，从而根据具体的客观现实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并且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这便是孙武所说的“计”。《计篇》位列《孙子兵法》十三篇之首，足见孙武对运筹谋划工作的重视程度。在孙武看来，“计”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正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而且这些“算”的工作要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得充分完成。

从已有的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在夏、商、西周时期便已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战略决策思想。从这个时期的战略决策实践来考察，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能够初步分析双方形势，综合谋划，充分准备。周为了灭商，充分估量到各自的强弱优劣形势，卧薪尝胆，潜心准备长达70年，最后一举成功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二是能够有意识地创造有利的战略环

^① 齐义农：《孙子兵法·计篇》（上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境，如发展生产以增强国力，加强训练以提高军力，联络诸侯以争取民心等。三是确立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如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等。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思想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战略理论形态方面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特征，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标志性理论成果，如《孙子》、《吴子》、《孙臆兵法》、《司马法》、《尉繚子》、《六韬》等。这些兵书从不同层面阐释和归纳了我国古代战略思想家对于战略和战争规律的理解与认识，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战略决策理论观点。而《孙子》作为中国古代战略决策理论起源的重要标志性成果，更是集中了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精华。第一，它从战略背景的角度出发，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的观点，提醒君主要注意分析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战争特点，重视“战争”这一极端重要的战略手段；第二，它明确提出止战思想，即重视战争的准备工作，争取做到“恃吾有所不可攻”，靠尽可能充分的备战达到推迟、延缓乃至吓阻战争爆发的先进战略思想；第三，要注意创造战略环境，主张将外交手段与战争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使外交贯穿于战争全程，战前要依靠外交工作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战争情势，战争进行中要善于“伐交”，在战略力量的配置上要讲求“造势”，创造出“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积极有利态势，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效果；第四，要注意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谋略等各种非战争措施和手段，收到“不越樽俎之间，折冲千里之外”的效果；第五，《孙子》对战略决策者地位和素质提出了明确的主张，提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这一重要命题，要求战略决策者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战争问题上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切莫将战争当儿戏，要求战略决策者要学会综合运用军事力量、谋略、时间、地形、气候等各种战略因素。

秦汉至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战略决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此期间产生了如刘邦、曹操、诸葛亮、成吉思汗、朱元璋等一大批著名的战略决策实践家和理论家，以及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兵书，如《三略》、《隆中对》、《战略》、《武经七书》、《武经总要》、《练兵实纪》等。这些兵书从不同层面和视阈研讨了战略决策问题，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决策理论的宝库。

二、西方管理学界对“战略”的理解

在西方，战略（strategia）一词最初也是军事用语，来自于希腊语动词“stratego”，原意为“将领”，也有“权力”、“军队”、“指挥”等意思。许多著名的军事家都对“战略”一词的含义给出了各自的解释。德国著名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将军在其成名作《战争论》当中是这样定义“战略”的：“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①而德国另一位军事战略家毛奇将军在其所著《毛奇军事论文集》一书中对“战略”的解释是：战略是一位统帅为达到赋予他的预定目的而对自己手中掌握的工具所进行的实际运用。

20世纪初开始，战略从最初的军事领域走入商业领域。1938年，巴纳德首次将战略概念引入管理理论。他认为，在需要做出决策的任何情况下，企业组织都应该遵循相同的原则，都必须考虑战略因素^②。而将战略与商业策略联系起来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战略在企业中的推广与应用使得企业战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一时间，关于企业战略的定义呈现了百花齐放的状态。如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把战略定义为：公司将自身与行业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的自我定位^③。有着“企业战略之父”美誉的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企业战略是“企业长期基本目标的决定以及为贯彻这些目标必须采纳的行动方针和资源分配”。长期担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麦吉尔大学管理研究部教授、法国枫丹白露欧洲管理学院组织学教授的著名学者亨利·明茨伯格，在《战略历程——纵览战略管理学派》一书中，根据人们对企业战略的不同理解，将战略管理归结为十个学派，并进而指出，战略的形成不但与价值观、远见和能力有关，而且与军队和宗教、危机和承诺、组织的学习和进化平衡的中断、产业组织和社会变革有关。他认为战略至少应当有五种定义：战略是计划（预期的战略），战略是模式（已实现的战略），战略是定位，战略是观念，战略是

① [德]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美] 切斯特·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王永贵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③ [美] 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策略^①。

近现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战略思想的关注度的提高，以及对其研究热情的不断升温，特别是巴纳德将“战略”概念引入经济管理领域后，人们对“战略”的理解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概念的应用范围已经逐渐从军事、政治、外交和企业这些传统领域延展到学校、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类组织机构，人才战略、教育发展战略、城市发展战略、区域一体化战略等词汇纷至沓来。

同中国古代的情形基本一致，西方古代的战略决策实践也经历了从史前时期到封建社会末期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历程。但由于各种原因，关于这些战略决策活动的记载保留下来的寥若晨星，拉美、非洲地区这方面的史料更是少得可怜。因此，关于西方古代战略决策的发展情况就主要以欧洲的希腊时期和罗马时期为代表。希腊人和罗马人很早就注意对战史的深入研究，力求获得战争规律和指导规律的认识。这是西方古代战略决策理论的萌芽。中世纪时期，西方战略决策理论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因为这个时期教会处于统治地位，文化封闭落后，缺乏创造力和实现理论创新的宽松外部环境。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战略决策理论逐渐摆脱了宗教迷信思想的束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战略决策实践家和理论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惠灵顿、克劳塞维茨等。《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不仅明确提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实现”这个著名论断，而且还概括出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若干战争指导和决策原则。这是对战争本质和战略决策活动规律的重要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则使战略决策活动彻底摆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使之成为一门指导人们从事“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各类管理活动的科学理论。

“战略”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多维性和权变性，导致人们对其定义的内涵与外延理解存在广泛差异。即便如此，东西方各家学者对于战略的基本

^① [加拿大] 亨利·明茨伯格等：《战略历程——纵览战略管理学派》，魏江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特征还是达成了某些共识。根据军事战略的本意,人们大体认同战略的如下几个特征: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性、现实性、竞争性。而“战略决策”则是从事战略管理活动的核心环节,其目标是对各类管理活动中带有全局意义的,有重大作用或影响的,甚至直接决定整个管理活动未来走向和最终结局的管理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筹划。

三、战略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战略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于西方管理学界的一个新事物。起初,人们试图将战略管理分解为目标制定、环境分析、战略制定、战略评价、战略实施和战略控制等若干与“管理”息息相关的步骤和任务,认为按部就班地落实好这些步骤和任务就是在进行有效的“战略管理”了。显然,这是对战略管理的狭义理解。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斯坦纳。1982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管理政策与战略》的书,指出企业战略管理是确立企业使命,根据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要素设定企业的组织目标,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并使企业使命得以实现的一个动态过程^①。另一种是宽泛的,或者说广义的战略管理概念。持这种看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著名战略管理学家伊戈尔·安所夫。他认为,战略管理是运用战略对整个企业进行战略性管理,主张将企业的日常业务决策活动同长期规划决策相结合^②。安所夫后来也被尊称为“战略管理之父”。

在战略管理理论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中,有三位学者做出了奠基性理论贡献。他们是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肯尼斯·安德鲁斯(Kenneth R. Andrews)和伊戈尔·安所夫(Igor Ansoff)。

钱德勒是美国著名的企业史学家。他的企业史研究三部曲《战略与结构》、《看得见的手》和《规模与范围》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美国等国大公司的发展历程,被学术界奉为企业史研究的经典。钱德勒虽不是管理学家,更称不上是战略管理学家,却是公认的战略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

^① Steiner G. A., Miner G. B., Gray E. R.: Management Policy and Strategy: Text, Readings and Cases.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82.

^② Igor Ansoff: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Policy, 1972, 2.